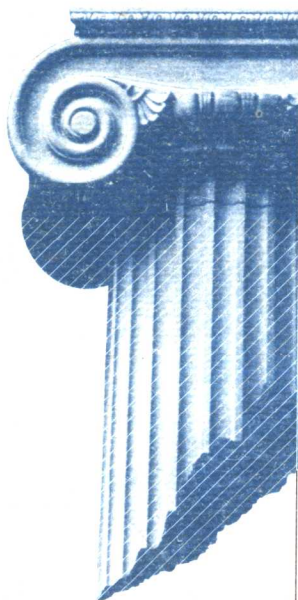


UK



当代英国 翻译理论

廖七一·等编著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UK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
许钧 主编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utside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等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

ISBN 7-5351-2864-5

I. 当… II. 廖… III. 翻译理论-研究-英国-现代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486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6 插页 15.5 印张

版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47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864-5/H·113

定价:29.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 总 序 -

许 钧

20 世纪过去了,人类已经迈入新的世纪。在新旧世纪的交替时期,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似乎都无一例外地在作自身历史的回顾,同时思考在新世纪的发展。20世纪,对翻译学科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6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向系统、科学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翻译学科在不断发展,在与其相关的学科群中的地位日渐提高。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相当深入地考察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参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翻译界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人

才的培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深切地感到,翻译学科的发展,任重道远。无论在学科的体制上,还是在翻译研究中,我们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也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我曾就我国近期译论研究的状况、目前译论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译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谈到,在目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倾向,十分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一是翻译文艺学派对语言学派的绝对排斥倾向。从最近一些翻译研究和外语教学的刊物所刊载的探讨翻译的文章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不少译论研究者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译论主张,将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标为文艺学派。在译论研究上,有自己的明确的理论追求和主张,并以此为基础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起自成一体的学派,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事。然而问题是,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在对翻译的探索中,我们往往处在种种矛盾之中,如艺术与科学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创作和模仿的矛盾,原作者与译者的矛盾等等,这诸多的矛盾使我们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习惯,致使翻译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往往相互排斥,水火不相容。二是中西译论的相互排斥倾向。在许多不同场合,我曾谈到在近十几年来的译论研究中,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如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而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总之,是不科学的;而另有一些研究者则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没有指导价值。目前,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排斥的倾向仍然存在,甚至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我们认为,翻译研究应该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诚如罗新璋先生所说,“任何一种翻译主

张,如果同本国的翻译实践脱节,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渊源的崭新译论,可以时髦一时,终难遍播久时。”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会遇到许多带有共性的问题,也会在几千年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一些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理论研究不能与本国翻译实践相脱节,并不意味着对别国,别的民族的翻译经验或理论研究成果的排斥。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看,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三是翻译研究的片面性倾向。翻译研究涉及的面很广,涉及的问题很多,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翻译学科的建设并不是一些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的简单相加,需要有一种整体的意识,宏观地加以把握并致力于理论的系统化,不然翻译研究就有可能因支离破碎,缺乏系统化而丧失其科学性。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深化翻译研究,进一步加强翻译学科建设,是摆在每个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近几年来,译界不少有识之士实际上一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杨自俭先生多次指出,译界要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不要用中国排斥外国的,也不要外国排斥中国的;不要用微观研究排斥宏观研究,也不要宏观研究排斥微观研究,而是应该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功夫。这里谈的,不仅仅是方法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我国译学建设的方向问题。译学研究要有理论意识,学科意识,这是翻译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上的保证。而要在实际工作中,把翻译研究推向深入,势必涉及到对中国文化遗产、传统译论如何对待,如何继承的一面,也涉及到对国外译学的优秀成果如何借鉴,如何吸收,融合的一面。最近读了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思想研

究》，沈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态度也十分积极，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严复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去创立和发展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外国已有的译论研究成果中去吸取营养”。我很赞同这一观点。我们都知道，翻译研究历史悠久，西方的译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的一篇题为《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公元前46年）的文章，我国的译论则以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约公元244年）为发端。在传统的译论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附有哲学、文化和语言的思考，在对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中西方译论有不少共同点，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认识、要求乃至标准等，也有相异的地方。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方译论家基本上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注重翻译原则、标准、过程以及具体方法的探讨，更多的是翻译的微观研究，对翻译本质，翻译理论体系，翻译价值等诸多重大问题缺乏交流与沟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译论家中有部分学者提出译论研究相互交流的重要性，指出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使翻译研究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必须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对翻译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挖掘翻译的本质内涵，客观认识与正确评价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比较与梳理中西译论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成果，构建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翻译教学理论。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上展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们的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从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为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翻译界有目共睹的贡献，《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中国翻

译词典》就是个明证。我认真读过丛书责任编辑唐瑾女士在1995年6月写的那段“编辑的话”，她对翻译事业的关爱和对译学建设倾注的心力，特别是随着她所策划和责编的一部部翻译研究著作的问世，使我看到了我国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在新世纪的希望。所以，当我有意组织国内译界从事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对外国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促进中外译论的交流时，我想到了她，写长信与她谈了课题的研究设想和具体计划，没想到唐瑾女士当即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加以肯定，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并与我多次商量，定下了编撰《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一些原则性意见。

首先，我们认为，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有翻译实践，就必然有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探索与研究。中外译论在长期的发展中，对翻译以及对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着各自的认识，有同有异。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国家，翻译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前苏联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法国的释义派理论、翻译诗学理论，德国哲学思辨与文化思考相结合的翻译研究，英国的“翻译研究学派”，美国的多元翻译理论以及加拿大的双语交流与翻译研究等等，对我国的译学研究都具有启迪意义。无论是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史，还是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研究，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之内。各个国家不同的研究途径、方法，也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第二，我们展开这项工作，既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也是从我国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我们看到，目前在国内翻译研究与教学中，国外的翻译研究资料相当缺乏，加之语言的障碍，各语种的翻译研究与教学人员，基本囿于各语种手头有限的一部分资料，对开拓研究视野，吸取外国译论研究的成果，有很

大的障碍。《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既可作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补充,促进中外译论的交融与发展,也可为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同行和有志于翻译事业的广大学生提供帮助。

第三,本丛书以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促进国内译论研究的发展,加快翻译学科的建设为目的,在掌握近四十年来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成果和资料,了解其现状,把握其趋向的基础上,按国别,有选择地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系统的研究与评介,介绍与评论相结合,力求有介绍,有评论,有比较,有分析。

第四,我们的翻译研究要体现一种开放、创新的精神,本丛书为一种开放性的丛书,除了前苏联、美国、法国、英国等国之外,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翻译研究也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有关成果,将视国内专家研究的实际进展,适时推出。

从我们提出研究课题和设想开始,到研究工作的实际展开,我们得到了国内外翻译研究专家和有关翻译组织、机构和大学翻译系的支持。国际翻译工作者联盟、《巴别塔》与《国际译联通讯》编辑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翻译委员会、法国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加拿大《煤地》编辑部等,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际知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纽马克、巴斯奈特、威尔斯、塞莱丝柯维奇、阿埃瑟朗、让·克洛德·热玛尔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林戊荪先生、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青岛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香港翻译学会刘靖之先生和岭南学院的张南峰先生,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本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译学建设和

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于南京玄武湖畔南京大学公寓

1999年7月4日

目 录

总 序

[1]

引 论

[1]

第一节 古典译论

[6]

第二节 近代译论

[11]

第三节 当代译论

[17]

第四节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译论

[30]

1

第一章 西奥多·萨瓦里：翻译的艺术

[44]

第一节 翻译是选择的艺术

[44]

第二节 翻译的分类

[50]

第三节 翻译的原则

[55]

第四节 诗歌的翻译

[62]

第五节 科技作品的翻译

[67]

2

第二章 乔治·斯坦纳：翻译的文学阐释学

[71]

第一节 语言与物质世界

[73]

第二节 理解即翻译

[92]

第三节 语言与真知

[96]

第四节 翻译理论探源

[103]

第五节 阐释过程

[109]

第六节 文化的拓扑结构

[118]

3

第三章 约翰·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124]

第一节 翻译的语言学

[125]

第二节 翻译的界定与分类

[127]

第三节 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

[136]

第四节 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

[144]

4

第四章 彼得·纽马克：科学、艺术和技能

[148]

第一节 语言意义和语言功能

[149]

第二节 翻译的性质

[157]

第三节 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

[165]

第四节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175]

第五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

[197]

5

第五章 罗杰·贝尔：模式、意义与记忆

[207]

第一节 模式

[208]

第二节 意义

[231]

第三节 记忆

[255]

6

第六章 哈特姆与梅森：译者——文本与读者的协调者

[266]

第一节 翻译：特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

[267]

第二节 语境与翻译

[269]

第三节 连贯与翻译

[292]

7

第七章 西奥·赫曼斯：翻译与规范

[302]

第一节 翻译研究及其目标

[304]

第二节 规范及其性质

[309]

第三节 翻译规范

[314]

第四节 翻译的性质

[321]

8

第八章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论

[329]

第一节 翻译与翻译研究

[331]

第二节 翻译的主要问题

[341]

第三节 文化翻译观

[360]

第四节 归化与异化

[370]

9

第九章 蒙娜·贝克尔：语料库翻译研究

[387]

第一节 发展的翻译观

[391]

第二节 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语料库

[394]

第三节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405]

10

第十章 当代英国翻译教学

[419]

主要参考书目

[451]

后 记

[473]

引 论

翻译是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几乎与语言同时诞生。从原始部落的亲善交往，文艺复兴时代古代典籍的发现和传播，直至今今天世界各国之间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频繁交流与往来，维护世界的稳定和持久和平，翻译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波拉德(A. Pollard)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的时候说：

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①

① Alfred Pollard, *Records of the English Bible.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Bible in English, 1525—1611* (London: H. Frowde/Oxford, 1911), p. 349.

翻译不仅仅被视为人类生存的果仁和甘泉,而且是人类精神和理想追求的阳光和神圣的殿堂。如果说一个民族的语言促进了民族的生存、团结和繁衍,那么,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无疑使各个民族文化摆脱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开拓了精神视野,增进了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和借鉴交流,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和平共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和繁荣。

英国海员很早就开始了海上开拓性的航行,到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小规模的海上活动迅速发展成英帝国海上势力的对外扩张。到19世纪,英国已经逐步占领了比本土大150倍的海外殖民地,囊括了世界1/4的陆地和1/4以上的人口,建立起大英“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海外扩张将英语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促进了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使用。今天,将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人,在双语社会中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以及因行政、职业、教育的需要而使用英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1/7。^①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扩大。由于英国以及讲英语的国家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英国的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在世界译坛上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就荷马史诗的翻译而言,英国先后就出现过查普曼、德莱顿、蒲伯、柯珀、纽曼、阿诺德、巴特勒、布切等人的重要译本或重译本。^② 不同的译作和译本的更新本身就标志着翻译活动的繁荣和蓬勃发展。从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个世纪英国都产生过至少一位在西方,甚至在

①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50—154页。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页。